

主编 吴泽
袁英光
桂遵义 著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近代史学史

上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K092
39
231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近代史学史

上册

吴泽 主编

袁英光

桂遵义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B 634511

中国近代史学史

吴 泽 主编

袁英光 桂遵义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市印刷厂印刷

开4.850×11.06毫米 1/32 印张 31 插页 4 字数 766,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册

ISBN 7-80519-123-9/G·19

责任编辑 王士强 定价：(两册)14.50元

前 言

中国近代史学史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学科。中国近代社会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传统史学各流派源流漫长，丰富多采；外来各种史学思潮纷至沓来，五光杂色。并且，它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史等密切相联系，互相制约着。所以，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内容异常丰富，我们应深入地进行探索，精确地进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化建设服务。

(一)

任何一门学科，随着它的日益发展成熟，都必然要在两个方面取得成绩：一是对它的研究对象的研究的深入，二是对本学科自身的研究的深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学，它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一般说来，主要包括历史实录和史学理论两大部分。评论任何史家、任何历史时期的史学总是离不开上述两方面内容的。

史学思想在史学史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它是史学的灵魂，无论哪一位史家，哪一个史学流派，都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的。因此，我们研究史学史，必须通过对各个时代的各个学派和史学家的

史学思想形成和演变的研究,探讨其历史学说的阶级属性、发展规律与特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些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对当时和后来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严复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我国来,对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就应作深入的研究。再如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他于1919年至1920年,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上的价值》等论文,后来又出版了《史学要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更应深入地进行研究和总结。史学思想在史学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撰写史学史著作如果只局限于史料等方面著述的介绍,而不写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是不完整的史学史著作。

就历史实录而言,其内容更为广泛。长期以来人们曾把史学史看作是历史编纂学史。历史编纂学就它的内容来说,主要是研究历史编纂和历史表述的方法、体例、结构和技巧的学科,亦即用哪种形式、哪种方法生动准确地反映千差万别的历史动态和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史实表明,历史编纂不仅是方法问题,而是有什么观点就有什么方法,二者是分不开的。因而历史编纂学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学”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历史编纂学,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的是不同的,要严格区别开来。因此,中国近代史学史不仅要研究编纂方法和表述形式的变化、发展,而且要研究与此相关联的有关编纂制度的起源和变化。因为各个历史阶段史学发展的状态,对史学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具体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同史学史研究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的历史是有区别的,它仅是史学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史中的历史编纂学部分,应表述

史学发展的规律，同时又要求写出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史的规律来。二者是一个完整的热体。

要研究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就一定要涉及到史料问题 and 如何处理史料的问题。我国由于历史悠久，历史典籍异常丰富，是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些著作除反映作者的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外，主要是记载历史事实。因此，在史学史的研究中就应注意历史著作中史料范围的不断扩大和鉴别分析的进步，以及史籍记载形态的演变、历史文学的发展变化等等，我们在研究史学家时，就应注意作者对史料状况的了解，以及如何考辨史料和正确运用史料问题。必须指出，史科学虽着重史料的研究与整理，但它同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旧史家对史料的详略、增减、抹煞或歪曲，都受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所支配。应当注意到，每个时代的史科学的状况，反映着当时史学发展的水平。而史学史本身则主要研究史科学本身的发展，确定其不同的价值、使用方法等等。可以说，史科学是研究史学的基础学科，其地位十分重要，是史学的主要辅助学科之一。

除上述几方面外，随着学科分工的发展，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随之扩大。如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地理等，都是与史学史发展相关联的学科，均应作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但这些学科只能作为史学发展的辅助学科，不能取代史学史的研究。还特别应当注意，由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映在史学上，外国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起有重大影响，不探本溯源，不易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有些学者片面鼓吹学习西方，主张“全盘西化”，给中国史学带来了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我们应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不研究外国史学，就没有一个综合比较的研究，也就不能认识各国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我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因此，研究中国近代

史学史，必须同时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我们认为主要是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和做好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由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方法受外来史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知识分子的色彩很浓，曾不断涌现各式各样的史学家、史学流派，各种历史记载、历史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精神文化演变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对近代人们的思想和要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基本任务，就是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要这样做，就必须通过对史学发展的大量材料的分析与概括，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这是比史学又高一层次的理论工作。

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批判地总结成果，对中国近代史学史来说，就是对近、现代历史著作的总结。所谓批判，是有肯定，有否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的历史著作来，使史学史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

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分期，主要是要表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要表明中国近代史学演变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构成史学演变发展的三个方面联系起来

进行考察：一是历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中的观点；二是史学家在编纂学上的成就，主要是编纂的体例和方法，其中包括史料的鉴别和考辨；三是史学范围的扩大，史书种类的增多。不仅如此，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分期，还必须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特点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因为史学的阶段性的发展，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脉搏而确定，经济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制约了史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应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学两大历史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学又分为三个阶段，本书据此为三编。

第一个阶段即第一编，为鸦片战争前后到太平天国时期，即1840年至1864年时期的史学。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乾嘉以来的封建旧史学的衰颓和日趋衰落，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日渐处于主导地位，龚自珍、魏源等倡导今文经学，主张改革政治，学术上提倡经世致用，特别重视当代史的研究，着重总结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爱国史家兴起了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热潮，力图利用外国历史资料作为揭露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的研究起有重大影响。

第二个阶段即第二编，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即1865年至1901年时期的史学。这时，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已退居次要地位，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逐渐传入，洋务派及其知识分子，为了办理洋务和外交的需要，也相当重视对外国史地的了解，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史学家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或则与外国人接触较多，对外国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或则到日本、英国、美国等中国驻外使馆任职，因而对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有更具体更深刻的了解，认识到外国的长技，不仅在科学技术如坚船利炮之类，而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所谓政事

上,眼界大为开阔,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对西方社会历史的理解逐步提高到理论上加以分析,认为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其办法是学习日本或者欧洲的英国。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特别重视史学的引用,把史学作为一种有力的斗争工具。他们或者借考证中国古史问题来提供维新运动的历史根据,以减少推行变法的阻力,或者介绍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图强的借镜。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在政治上兴民权,抑君权,设议院,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开始学习外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并接受其影响,对过去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旧史学,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进行了极其初步的批判。康有为首先在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宣传进化史观,严复又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史观,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政治思想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对史学也起有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反对清贵族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摆脱民族压迫,是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它促使新史学思潮围绕当时的中心任务而兴起。因而进一步批判了封建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蓬勃兴起,改良主义史学家梁启超等人,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中提出了建立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力求“新史”与旧史有所区别,以为其实行君主立宪政治服务。

第三个阶段即第三编,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即1902—1919年时期的史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史学在维新变法高潮时已崭露头角,代表救亡图存的另一路线。它深入批判封建旧史学,将自己的主张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应用许多历史事实阐明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驳斥改良派对历史上人民革命的攻击,号召和动员

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章炳麟在这一时期曾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约之百卷，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①力图在该书中摒弃旧史学只会排比事实的陈腐作法，而“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达到“鼓舞民气，启导未来为主”^②的目的。他在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运用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必要，痛快淋漓地驳斥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派级革命的谬论。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也在领导和宣传革命学说时，曾对一些历史问题有精辟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国事业中的作用，驳斥了个人是历史“原动力”的谬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在史学战线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在世界史和革命史方面展开了斗争，他们各自根据斗争的需要，编译了不少世界史和革命史论著，从而使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着革命与改良在史学领域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就全国范围来说，改良主义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不仅梁启超等人写了大量论著，而且夏曾佑写出了《中国古代史》，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地主阶级史学家亦在竭力挣扎，如王先谦编撰了《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继续宣扬封建旧史学历史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出现了如王国维等古史学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对五·四后的中国史学起有很大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史

^①章炳麟：《越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②章炳麟：《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页。

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在史学战线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了，出现了李大钊、郭沫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

郭沫若在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划时期的历史巨著，于1930年正式出版发行，“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用历史事实驳斥那些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学说的理论，通过大量甲骨、金文等资料的研究和分析，阐述了自殷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作出了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等阶段的论断，从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时候，正值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发生了一场“风靡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是捍卫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郭沫若在该书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1934年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肯定了我国存在着原始公社制社会。1936年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肯定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西周是封建制社会，开创了西周封建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法西斯史学家秋泽修二连续推出了《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宣扬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只有外力才能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动谬论。这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的谬

论进行反击,作出了巨大贡献。吕振羽从1939年至1940年,连续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论著,对法西斯史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特别是《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出版,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吕振羽指出该书:“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斗争过程的若干情况,也反映了有关各派对中国史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参考资料。”^①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1943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为突破点,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断,明确指出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也经过了奴隶制社会。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完全适合于中国。与此同时,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过程及其规律。1942年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社会简史》,也着重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

在通史方面,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葛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先后在1941年、1942年出版,这些著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研究中国通史的代表作。它们的出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思想史方面也取得了成就。这一时期吕振羽的《中国政治

^①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新版序》,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页。

思想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述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述史》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著作先后出版。郭沫若也撰写了《青溪时代》、《十批判书》，杜守素出版了《先秦诸子批判》等著作。他们阐明了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传统的和规律、特点。其他专史研究方面如民族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专著先后出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有重要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陈垣、钱穆等人在古代史研究、历史地理和元史研究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影响。

(三)

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看，而是把它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新旧史学演变的历史阶段来研究，故应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上加以透视。因而在本书的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章节中注意论述史学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注意把握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封建旧史学度过了风雨飘摇的衰亡时期。龚自珍、魏源、王韬、黄遵宪及至后来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等有志之士，在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包括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在内的西方文化。但是，过去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对外国思潮的引进，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正确了解外来思潮的真实内容，由于没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没有与总结我国传统的历史学相结合，结果都失败了。如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家魏源虽然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是他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资产阶级的长技，他所“师”的仅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火药武器即坚船利炮之类，幻想用西方的军事技术来制夷，利用西方的资产阶级技术来为封建王朝服务，其结果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又如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黄遵宪等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虽比魏源深入了一步，已注意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但他们的引进局限于君主立宪制度，并没有正确了解外国文化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外来文化的阶级实质和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真实内容，而是宣扬“全盘西化”，其结果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因此，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都不可能正确地符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批判地引进。只有从191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史学上能够正确的对待外来文化和引进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洋为中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建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今天，对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要不要引进的问题，而是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如何更好地引进和开放，使其能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关于如何论述中国近代史学史，在编纂的体裁上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本书虽然也采用章节体，对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按史学发展的阶段性，按时代顺序介绍人和书，但本书不同于以往史家撰述的方法。过去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在章节的安排上，大多都是一人单独成章或节，一个人要经历几十年，不同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历史研究著作集中在一个章节中叙述，它的优点是：从宏观上来看，比较容易看出的纵的联系，在形式逻辑上有其长处。但它的根本缺陷是：不能把作者在长达数十年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历史背景所产生的思想观点上的变化发展，置于一个特定时代总

的发展思潮中，从总体上进行论述，而往往是作为孤立的现象去处理。这种编纂方法，更看不到某一时期史学战线上各家各派史学活动的全貌，以及作者在这一时期史学战线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同一时期各家各流派在史学上的对立斗争和互相渗透的情况，看不到某一时期史学战线的全貌。事实上，史学的发展过程，是历史资料不断积累、历史记录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的不断趋于复杂和相互斗争的过程和结果。我们研究史学史必须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抓住每一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探索出当时各个社会形态中史学发生、发展、演变递嬗的规律，据此订出编、章、节，以便深入阐明各个史家、各个学派在某一特定时期的阶级地位及世界观、史学观，究明每一历史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阐明史料存在的状况、史学本身发展的源流，各个时期不同历史学派的历史编纂学和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各个史家、各个史学流派的矛盾斗争。如魏源在史学领域内活动长达四十余年之久，写有四大史学著作：《圣武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我们不是放在一章中并列地加以叙述，而是根据其不同的写作时代，不同的编纂历史背景，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影响，分别列入不同的章节中加以论述，如《圣武记》是写于鸦片战争前夕而完成于鸦片战争时的著作，其时正是清王朝衰微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进行侵略，魏源目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故积极寻求富强之道，歌颂清初“盛世”武功，希望中国转弱为强，整武备、雪国耻，不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并且成为“军政修”、“官强”、“兵昌”、“令行”、“四夷来王”的强大国家，这种强烈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当时顽固派的卖国思想，恰成鲜明对照。因此，我们将它置于乾嘉封建正统史学的分解与没落一章中加以叙述，藉以看出当时史学战线的全部活动面貌，和各史

家、各史学流派相互斗争的情况。《海国图志》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著作，其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都和前者不同。因此，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不仅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情况超过了以往这一方面的著作，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以及海防的见解，阐述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抒发自己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义愤，特别是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所谓“师夷”思想，是魏源先进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使《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放射出光芒，给人们以一种希望和力量。

这一时期在反侵略爱国思想指导下的著作，还有梁廷枬的《海国图说》和《夷氛闻记》，对鸦片战争胜负归于封建宿命论观点和唯武器论、唯将帅论等观点进行了批判。夏燮也撰写了《中西纪事》，表达他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和主战思想，对投降派则进行了揭露和谴责。这时，投降派的著作有黄恩彤的《道光抚远纪略》和《抚夷论》，为投降派的屈膝投降进行辩护，将鸦片战争爆发的罪责归咎于林则徐，是一部颠倒是非的著作。为投降派辩护的还有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溥野史编撰的《庚申夷氛纪略》。

魏源的《元史新编》则写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时期，它主要是总结元朝的“衰亡之道”，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此时，魏源由地主阶级改革派立场走向了反面，由主张进行政治改革演变成对抗农民起义，表现了他鲜明的地主阶级立场。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史学家为了对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夏燮还编纂了《明通鉴》和《粤氛纪事》，徐鼐编撰了《小腆纪年附考》和《小腆纪传》等书。

我们认为这样安排编、章、节，比较能深入阐明各个史家、各个史学流派在某一定时期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历史观，能究明每一历史著作编写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以及各个史家、史学流派对立斗争或相互渗透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历史编纂学原则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委托吴泽教授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材。当时，翦伯赞同志任历史组编审组长，为了促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编写，他亲自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编写的一些原则问题，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和尹达等同志应邀参加了会议，他们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十年动乱”，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编写工作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又重新把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列入教材编写计划。值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十分怀念曾经关心我们编写工作的老一辈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谨表衷心的感谢和深切的悼念。

本书编写过程中，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田珏同志给予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刘寅生教授和盛邦和、胡逢祥、张承宗、张文建、周创民、陆新生和燕酒等同志，分别撰写了有关专题的长编和论文。江苏古籍出版社王士君同志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的编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水平，本书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难免有不妥之处，恭请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